

# 论汉代鼓吹的类别及流变<sup>\*</sup>

孙尚勇

**提 要** 西汉有三种鼓吹乐: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短箫铙歌和横吹。自西汉武帝至东汉明帝时期,横吹始终作为乘舆武乐来使用,直到东汉章帝建初以后,以之给赐边将军,横吹才获得了军乐的身份。正因为它从四品乐第三品“黄门鼓吹乐”加入到第四品“短箫铙歌乐”当中,这才使得短箫铙歌也获得了鼓吹的名号。“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之所以内容驳杂,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原本曾分别隶属黄门鼓吹乐和短箫铙歌乐。就乐器组合来看,鼓吹最初指箫(长箫)与鼓合奏的乐奏形式。西汉武帝时,它兼指以胡角和横笛为主要乐器的横吹曲;东汉章帝时,它又兼指以箫(短箫)和铙为主要乐器的短箫铙歌。流行于魏晋南北朝的“鸣笛以和箫声”的鼓吹曲,大约形成于和帝永元年间;这标志着汉代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与汉武帝时代新兴的短箫铙歌在东汉中后期逐渐走向融合。

**关键词** 鼓吹 短箫铙歌 横吹

关于汉代鼓吹与横吹,虽有不少论著陆续详加探讨,<sup>①</sup>但许多问题一直未获完善合理的解释。比如:崔豹为什么说“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sup>②</sup>沈约为什么说鼓吹“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sup>③</sup>郭茂倩为什么说“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异尔”、“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sup>④</sup>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为什么内容驳杂?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汉代鼓吹究竟有哪几种类别,它们在两汉的历史流变如何?本文拟在全面借鉴检讨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 一 汉代鼓吹的三个类别

蔡邕《礼乐志》述东汉四品乐曰:“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

<sup>\*</sup>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乐府通论”(批准号 07XZW006)的成果。

① 比如王运熙:《说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考》,《乐府诗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1996 年版,第 210—226 页;赵敏俐:《〈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研究》,《周汉诗歌综论》,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64—397 页;孙尚勇:《黄门鼓吹考》、《横吹曲考论》,《乐府文学文献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8—104、202—228 页。

② 《古今注》卷中《音乐》,四部丛刊本。

③ 《宋书·乐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558 页。

④ 《乐府诗集》卷 16 鼓吹曲辞序,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版,第 585 页;《乐府诗集》卷 21 横吹曲辞序,第 715 页。

风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sup>①</sup>这段话是研究汉代鼓吹的重要资料,它明确了汉代鼓吹的两个类别:黄门鼓吹和短箫铙歌。这段话未明确提到横吹,但据《古今注》、《乐府诗集》等文献,横吹是汉代鼓吹的另一个重要类别,它和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一道构成了黄门鼓吹。汉代鼓吹概念的上述三重内涵,正是沈约“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之说法的历史依据。由于蔡邕《礼乐志》过多地将鼓吹与《诗》、《周礼》相比附,这给后来的学术研究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近年研究者追索鼓吹乐先秦渊源的研究思路便与蔡邕的论述密切相关。<sup>②</sup>在肯定了汉代鼓吹的先秦渊源的同时,研究者又肯定了它对外来影响的接受。<sup>③</sup>以上观点,均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军乐鼓吹立论,基本忽略了汉代不同类型的鼓吹曲在渊源、使用乐器、最初“所用异尔”的存在状况以及它们在两汉时期由独立走向逐步融合的发展过程。

本文认为,汉代最初的鼓吹曲的确有先秦的渊源。刘勰论西汉乐府所掌鼓吹便涉及了“轩岐鼓吹”和“汉世”铙歌,<sup>④</sup>因而,对汉代鼓吹的先秦渊源作适当探讨是必要的。但被王珉和宋新等学者引以作为在“鼓吹”名称尚未出现时就存在类似后来鼓吹曲的《周礼》和《诗经》的有关资料,其中所载的“鼓吹”音乐所对应的场合是重大祭祀和燕射,而没有运用于军队的。蔡邕《礼乐志》所举之凯乐和凯歌,用于“大献”之仪,同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乐。下文所举三种出土战国音乐图像资料所反映的用于宴乐仪式的“鼓吹”,同样与军乐无关。而且,几乎所有先秦文献和文物资料所反映的类似于后来鼓吹乐的音乐,都以编钟和编磬为主要乐器,这与汉代新兴的两种鼓吹乐—短箫铙歌和横吹曲—存在很大差异。那么,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作为军乐的短箫铙歌、乘舆以为武乐的横吹这三种汉代鼓吹各自的特点如何?后世通常说的军乐鼓吹与它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它们在两汉是如何发展的?以下依次讨论之。

## 二 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

一般认为,汉代鼓吹曲最早的记录见于班固《汉书·叙传上》:“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牛马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南朝宋齐时刘勰(434—489)《定军礼》据以立论曰:“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骚人曰‘鸣篪吹竽’是也。”<sup>⑤</sup>于是,后来学者普遍认为班壹是鼓吹乐的创始者,<sup>⑥</sup>甚至有人说“这是汉代军乐吸

① 徐天麟:《东汉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② 王珉:《鼓吹乐起源说》,《音乐艺术》2003年第4期。宋新:《汉代鼓吹乐的渊源》,《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3期。

③ 李石根:《宫廷鼓吹与民俗鼓吹》,《音乐研究》1999年第2期。王珉:《鼓吹乐起源说》,《音乐艺术》2003年第4期。

④ 《文心雕龙·乐府》:“至于轩岐鼓吹,汉世铙挽,虽戎丧殊事,而并总入乐府。”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页。

⑤ 《乐府诗集》卷16鼓吹曲辞序引,第583页。

⑥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陈四海:《浅谈鼓吹乐》,《音乐世界》1987年第6期。杨泓:《汉魏六朝的军乐—“鼓吹”和“横吹”》,《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

收北狄之乐的确切记载”。<sup>①</sup>事实上,刘瓛《定军礼》以班壹为鼓吹之始的判断显然是参照《汉书·叙传上》的说法,并结合宋齐时代鼓吹乐“鸣笳以和箫声”的音乐特点而作出的判断。这一判断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后之学者以此立论自然更见偏颇。理由有二:首先,以宋齐时鼓吹乐的演奏乐器来逆推汉初班壹所用鼓吹的情形未必准确;其次,班固并未明言班壹之“旌旗鼓吹”直接源自楼烦一带之民族音乐。因此,据现有资料,只能认定班壹可能是最早使用“旌旗鼓吹”而进入历史记录的人,但未必就是所谓创始者。考《叙传》前文云,班姓为战国楚令尹子文之后,“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综合《叙传》文,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鼓吹源自于楚地,由班姓族人带到了楼烦一带。仔细推敲上引“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的话,还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孝惠、高后时,中央汉廷亦有鼓吹,因为“与民无禁”,故班壹得以出入皆奏“鼓吹”。照上述理解,可以对西汉早期的鼓吹作出如下三个方面的初步判断:

其一,《汉书·叙传上》的“鼓吹”一词是作者班固或其父班彪以东汉久已流行的“鼓吹”概念以名其先祖班壹在西汉初所使用的类似击鼓吹笙(或箫)的乐奏形式。

其二,可以联系司马相如《子虚赋》“拊金鼓,吹鸣籥”、<sup>②</sup>汉武帝《秋风辞》“箫鼓鸣兮发棹歌”<sup>③</sup>的鼓(或钲)、箫合奏的鼓吹,来理解汉代鼓吹的稍早形态。相如赋作于景帝中后期或武帝初年,武帝辞作于天汉元年(前100),<sup>④</sup>均未像班固《西都赋》那样直接说“鼓吹震”,<sup>⑤</sup>这表明武帝前期鼓吹概念尚未流行;结合武帝、宣帝以鼓吹赐边郡和属国之事,<sup>⑥</sup>可以确定,鼓吹这一音乐品种的概念大约正式形成于武帝中后期。

其三,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晚期墓1:51号舞乐狩猎纹瓦绘有“有鼓有篳,有笙有拊,有歌有舞”的宴乐场面,<sup>⑦</sup>故宫博物院藏战国宴乐渔猎纹铜壶绘有编钟、编磬、鼓、竖笛等合奏的宴乐场面,<sup>⑧</sup>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战国墓宴乐武舞纹铜壶绘有编钟、编磬、笙、鼓、丁宁等乐器合奏的宴乐武舞图,<sup>⑨</sup>这三则出土图像资料说明,汉代正式命名的“鼓吹”,其表演形态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由此可以进一步确定,班壹的鼓吹的确有可能来源于楚地,而未必就是边地民族的音乐。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理解为什么蔡邕《礼乐志》和崔豹《古今注》等均将鼓吹追溯至“黄帝岐伯”时代,并将它与《周礼》的有关记载联系起来。

① 宋新:《汉代鼓吹乐的渊源》,《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3期。

②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13页。

③ 《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6页。

④ 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5页,第186页。

⑤ 《文选》,第22页。

⑥ 元鼎六年(前111)，“南平百越，始置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郁林、苍梧凡七郡，立交州刺史以统之。以州边远，山越不宾，宜加威重，七郡皆假以鼓吹。”（《北堂书钞》卷130引《晋中兴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页）元封三年（前108），“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后汉书·东夷传》，第2813页）元康元年（前65），龟兹王绛宾与夫人乌孙公主女来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汉书·西域传下》，第3916页）

⑦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5页。

⑧ 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第296—297页。

⑨ 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第299页。

### 三 作为军乐的短箫铙歌

本文认为,探讨作为军乐的汉代鼓吹乐短箫铙歌的起源不必过多地考虑先秦是否有过类似的仪式音乐,而更应该关注此类鼓吹乐之所以在汉代兴起的内在原因。这就是汉代社会的现实需要,当时中外文化的密切交流为这一需要的实现提供了必备条件。

蔡邕《礼乐志》:“汉乐四品……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古今注·音乐》:“短箫铙歌,军乐也。”这两种较早文献都明确了短箫铙歌的军乐身份。《通典·乐六》、《旧唐书·音乐志二》都说:“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sup>①</sup>但这里“鼓吹”所指实际上是短箫铙歌,而不是上节讨论的继承先秦传统的汉代鼓吹。军事史研究证明,“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sup>②</sup>的西汉武帝统治期间,正是骑兵在中国古代开始盛行的时代。<sup>③</sup>“马上奏之”的军乐短箫铙歌,正是适应汉政权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而出现的。

常任侠从使用乐器的角度肯定了短箫铙歌的域外来源。<sup>④</sup>薛克翘指出,“中国的音乐发展到汉代,基本上保持了上古的传统,但也接受了西域,特别是印度的某些影响,出现了‘鼓吹铙歌’。‘鼓吹铙歌’是军乐,东汉人蔡邕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据考证,在古代的战争中最先使用乐队的是印度人,其乐队中使用的乐器既有打击乐又有管弦乐,也就是说,印度古代的军乐才是真正的军乐。而同时期(公元前三世纪以前)的其它民族,如希腊、罗马、埃及、中国等,都没有在作战时使用过完整的乐队。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从西域得到《摩诃兜勒》曲。……应当说,‘鼓吹铙歌’作为中国的军乐,形成于汉代,而且吸收了印度音乐的影响。”<sup>⑤</sup>案薛克翘认为汉代音乐保持了上古的传统,这一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中国音乐史的实际状况;他将“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合论,亦不完全符合西汉鼓吹的实际状况;但是,他从中外文化交流和军乐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角度所提出的看法,可以提示我们进一步思考汉代新兴鼓吹乐的产生机制。

综合上述,可以确定以下四点:

其一,从最初的军乐身份来看,汉代新兴的鼓吹—短箫铙歌,是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接受异域民族军乐的影响,适应现实需要而兴起的。

其二,结合前面有关鼓吹这一音乐品种的概念形成于武帝时期的讨论,可以确定,“鼓吹的兴起,是在汉初”这一笼统的看法并不准确。<sup>⑥</sup>汉代新兴的短箫铙歌兴起于汉武帝时代,它与乐府机构直接相关。

其三,从前述出土图像资料和《周礼》的相关记载来看,铙未曾用于宴乐场合的合奏,而“汉鼓吹曲曰铙歌(歌)”、“鼓吹,盖短箫铙歌(歌)”<sup>⑦</sup>的表述证明,汉代的短箫铙歌最初是独立于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乐之外而发展起来的。到了东汉明帝之后,它由军乐逐

① 《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25页;《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1页。

② 《汉书·礼乐志》,第1032页。

③ 杨泓:《骑兵与甲骑具装》,《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第138页。

④ 常任侠:《汉唐间西域音乐艺术的东渐》,《音乐研究》,1980年第2期。

⑤ 薛克翘:《佛教与中国文化》,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199页。

⑥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110页。

⑦ 《宋书·乐志一》,第554、558页。

渐成为鼓吹乐的主要成份。

其四,短箫铙歌的新变既不全在于乐器,也未必在于乐曲,而主要体现在音乐观念的新变上。短箫铙歌所使用的铙不再像先秦那样只是用于战阵“鸣铙且却”、“铙所以止鼓”<sup>①</sup>的单一指挥进退的军事实用性乐器,它已经演变为带有娱乐性的打击乐器了。

以上所论四点,决定了汉代第二种类型鼓吹乐—短箫铙歌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它与先秦类似音乐以及继承先秦传统的汉代鼓吹的本质不同。

#### 四 乘輿以为武乐的横吹

横吹的记录最早见于西晋崔豹《古今注》,陈代智匠《古今乐录》承之。《古今注·音乐》:“横吹,胡乐也。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进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见世用……十曲。”《古今乐录》曰:“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城,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万人将军得之。在俗用者有……十曲。”<sup>②</sup>这两则较早记载都强调了胡乐《摩诃兜勒》的特殊乐器横吹。常任侠指出,横吹即横笛,源自西羌民族,与中国传统的竖笛不同:“汉时所谓横吹,疑即横笛,为鼓吹乐中的重要乐器。马融《长笛赋》说:‘此器起于近世,出于羌中’,因此又称羌笛或胡笛。……《文献通考》(乐考五)说:‘大横吹,小横吹,并以竹为之。笛之类也。’是横吹可能就是横笛。名之为横吹,盖以别于竖吹。”<sup>③</sup>

《晋书·乐志下》和《册府元龟》卷五七〇“夷乐”则强调了《摩诃兜勒》的特殊乐器胡角:“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十曲。”<sup>④</sup>“武帝时,博望侯张骞入西域,得胡角,传其法于西京(原注:横吹双角即胡乐也),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为乐舞。”<sup>⑤</sup>薛克翘说:“据日本学者考证,‘摩诃兜勒’是个梵文词, mahaturya。词根 maha 是‘大’的意思, turya 是一种喇叭形乐器,合起来就是‘大喇叭’的意思。那么,《摩诃兜勒》曲便是一种以大喇叭为主旋律乐器的军乐。”<sup>⑥</sup>案《摩诃兜勒》,或以为源自大夏国(吐火罗、兜勒)具有佛教艺术特色的乐曲<sup>⑦</sup>,或以为源自马其顿。<sup>⑧</sup>无论《摩诃兜勒》历史真相怎样,它来源于外国可以肯

① 《周礼·大司马》及郑玄注,《周礼注疏》卷29,《十三经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页。

② 《后汉书·班超传》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78页。

③ 常任侠:《汉唐间西域音乐艺术的东渐》,《音乐研究》,1980年第2期。

④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5—716页。

⑤ 《宋本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71页。

⑥ 薛克翘:《佛教与中国文化》,第199页。

⑦ 王耀华:《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摩诃兜勒〉考证研究的参考资料》,《人民音乐》,1984年第11期。

⑧ 杨共乐:《张骞与马其顿音乐的传入》,《华学》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263页。

定。总之,李延年所造横吹曲二十八解的异域渊源可以肯定。

据上引《古今注》和《古今乐录》等记载,胡曲《摩诃兜勒》经张骞带到长安之后,由李延年改造为横吹“新声二十八解”。横吹二十八解的原始身份是否确为军乐不可知,但在西汉,它最初是“乘輿以为武乐”,即专门歌颂皇帝武功的乐舞,<sup>①</sup>与执干戚以舞的武舞有相似的功能;直到东汉,它起初“以给边将军”,至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才正式成为军乐之一种。案和帝于章和二年(88)至元兴元年(105)在位,依照《古今注》的表述,可以确定:章和二年以前,东汉已经以横吹赏赐给边将军作为军乐了,推测其事约在汉明帝于永平三年(60)定汉乐四品之后;章和二年后,一般统领万人的将领亦得以横吹为军中之乐。此外,还有必要讨论一下横吹在东汉明帝四品乐中的归属及四品乐本身在后来的发展变化情况。东汉明帝所定四品乐的完整记录见于南宋徐天麟《东汉会要》。据《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所引蔡邕《礼乐志》,<sup>②</sup>具体为:太予乐,周颂雅乐,黄门鼓吹,短箫铙歌。在汉明帝四品乐中见不到“横吹曲”的名目,而据《古今注》等的记载,它在汉武帝时作为乘輿武乐使用;据《后汉书·祭遵传》光武帝于祭遵营中“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的记载,<sup>③</sup>东汉初承西汉武帝之制,将横吹纳入黄门鼓吹,主要供宫廷使用。也就是说,横吹与前述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一并隶属黄门鼓吹。正因如此,郭茂倩才作出了“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异尔”、“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的记述。

我曾经认为,“汉明帝以‘短箫铙歌’名第四品之军乐,后分为二,有箫笳者为鼓吹,有鼓角者为横吹。鼓吹用于朝会、道路、给赐,横吹专用于军中”。<sup>④</sup>这个说法需要修正。实际上,在明帝定四品乐时,“短箫铙歌”用作军乐一品,即前述西汉的第二种鼓吹乐;此时,横吹继承了西汉武帝时期的传统,是作为乘輿武乐使用的。至于横吹之用作军乐大概最早只能在汉明帝之后,因为明帝不大可能随意改变自己确立的四品乐的内容。换言之,东汉四品乐第四品“短箫铙歌”的内容只是在明帝之后才加入了横吹曲;汉明帝时期及此前,横吹曲和继承先秦传统的箫鼓合奏的鼓吹曲共同以鼓吹(黄门鼓吹)的名义在社会礼仪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而短箫铙歌当时则并未名鼓吹,它只是用为军乐,也有可能以军乐的身份参与国家重大礼仪活动。而正是由于横吹以“鼓吹”之名用作军乐,短箫铙歌万获得了鼓吹的名号,崔豹“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之说则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 五 学术界有关汉代骑吹的理解

《宋书·乐志一》:“应劭《汉鹵簿图》,唯有骑执箠。箠即箠,不云鼓吹。……《建初录》云,《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皆骑吹曲,非鼓吹曲。”<sup>⑤</sup>据《宋书》所引应劭和《建初录》的说法,东汉时,鼓吹曲与骑吹曲是有分别的。故《中国音乐词典》将鼓吹乐分为四类:“(1)黄门鼓吹。由天子近侍掌握,主要列于殿廷,备食举乐。黄门鼓吹亦用于专用的‘鹵簿’(仪仗)。……(2)骑吹。用于鹵簿,随行车驾。应劭《汉鹵簿图》说:‘骑吹执

① 参见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第210—211页。

② 徐天麟:《东汉会要》,第118—119页。

③ 《后汉书》,第741页。

④ 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第102页。

⑤ 《宋书》,第558—559页。

筳。’汉画象砖中,骑吹并见筳、鼓、鞀、箫等。(3)短箫铙歌。主要用于社、庙、‘恺乐’、‘元会’、‘郊祀’、‘校猎’等场面盛大的活动。(4)横吹。用为军中马上之乐,随军演奏。……”①《中国音乐词典》对鼓吹曲的解释,存在不少错误。举其要,约有二:

首先,区别各类的标准不确定。如果说其分类是以功能(用途)来区别的话,那么,黄门鼓吹之“列于殿廷”与“短箫铙歌”之用于“元会”有何区别?骑吹之“用于卤簿”与黄门鼓吹之“用于专用的‘卤簿’”有何区别?

其次,与相关文献记载相违背。蔡邕《礼乐志》分明说“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那么,黄门鼓吹为什么同样“列于殿廷,备食举乐”?蔡邕《礼乐志》明确说“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它的主要功能为什么又变成了“用于社、庙、恺乐、元会、郊祀、校猎等场面盛大的活动”呢?据前文所述,横吹曲最初“乘輿以为武乐”,它作为军乐是在汉明帝之后。

《中国音乐词典》对鼓吹分类出现错误的原因,还在于对骑吹的认识不够。它仅仅根据应劭的说法,判定骑吹的功能是“用于卤簿,随行车驾”。但是《汉书·礼乐志》孔光等罢乐府奏有“骑吹鼓员三人”,用于“朝贺置酒陈殿下”的仪式之中,却不是“用于卤簿”(详下引文)。王运熙先生认为,鼓吹和骑吹的差异在于“乐人从行时所乘工具的不同”,骑吹“为骑乘于马上的鼓吹乐人”。②孔光等罢乐府奏涉及骑吹的一段话如是:“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邯鄲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员三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楚严鼓员一人,梁皇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三十五人,兹邠鼓员三人,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③韩宁在否定了王运熙先生关于骑吹的观点之后,对孔光奏所涉骑吹给出了新的理解:“在保留的乐工人员中只是列出了‘骑吹鼓员’,并没有一个种类叫‘鼓吹鼓员’,那么这些人员可能都是在演奏鼓吹乐,通称鼓吹人员,‘骑吹鼓员’只是其中一个种类的演奏人员。……在汉代,鼓吹乐的演奏是需要诸种类演奏人员的,骑吹只是其中的一种。也许在称呼上会出现以骑吹来代鼓吹的情况,所以在称骑吹时,事实上指的就是鼓吹。”④韩宁的结论正确与否可置不论,但称“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的大乐鼓员等皆为演奏鼓吹的乐人,则肯定是错误的。按照韩宁的逻辑,凡“鼓员”无一例外“可能都是在演奏鼓吹乐”,那么,孔光等奏中另外涉及的“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不应经法”的安世乐鼓员、沛吹鼓员、族歌鼓员、陈吹鼓员、商乐鼓员、东海鼓员、长乐鼓员、纛乐鼓员等八类鼓员 128 人,以及单列的楚鼓员 6 人,是否无一例外“可能都是在演奏鼓吹乐”呢?本文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

上文曾引《通典·乐六》、《旧唐书·音乐志二》“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之语,并指出这里的“鼓吹”指的是短箫铙歌,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为骑乘于马上的鼓吹乐人”骑吹呢?据孔光等罢乐府奏和《建初录》,西汉武帝设立乐府到东汉章帝建初(76—84)年间,鼓吹曲和骑吹曲的确有所分别。综合上论,可以确定以下两点:

其一,以骑吹为区别于鼓吹而独立自为一类的歌曲,是西汉武帝至东汉建初年间的一

① 《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4 年版(2007 年 7 月第 6 次印刷),第 126 页。

②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3 页。

③ 《汉书·礼乐志》,第 1073 页。

④ 韩宁:《〈乐府诗集〉“鼓吹”概念考论》,《文献》2005 年第 4 期。

个阶段性现象。《宋书·乐志一》在引述《建初录》之后说:“此则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也就是说,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及此前,以殿庭所用为鼓吹,以从行所用为骑吹,二者所用歌曲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在建初之后可能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建初录》所说的骑吹曲之一《远期》(《远如期》)便列于“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当中。<sup>①</sup>故就整个汉代鼓吹曲的发展来看,骑吹曲不足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鼓吹乐品类。从《宋书·乐志一》的说法来看,南朝时并不存在鼓吹、骑吹相区别的问题。曹操的鼓吹本应骑马,但不称骑吹,<sup>②</sup>说明鼓吹与骑吹之别至迟在建安年间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其二,卫宏《汉旧仪》:“黄门令领黄门谒者。骑吹曰冗从,仆射一人,领髦头。”又曰:“黄门冗从持兵,无数,宣通内外。”<sup>③</sup>据此,黄门冗从为骑吹,而平时又兼持兵护卫、宣通内外之责,它们实际上就是黄门鼓吹。<sup>④</sup>建初年间及此前的骑吹曲所指可能为黄门鼓吹乐中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而言,它区别于新兴的鼓吹品种短箫铙歌。因此,骑吹似不能视为跨越时间较长且涵盖面较广的音乐品种鼓吹曲的类别之一。

## 六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

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性质如何,它是否全为军乐的问题,学者讨论颇多。宋末元初马端临较早提出汉鼓吹铙歌并非全为军乐:“以其名义考之,若《上之回》,则巡幸之事也;若《上陵》,祭祀之事也;若《朱鹭》,则祥瑞之事也;至《艾如张》、《巫山高》、《钓竿篇》之属,则又各指其事而言,非专为战伐也。”<sup>⑤</sup>

现代学者对此亦多有论述。王运熙先生说:“铙歌在汉代施用颇广,朝会、道路、给赐均用之,其歌词本不必与军事有关。”<sup>⑥</sup>赵敏俐进而指出:“鼓吹在汉代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主要指汉代宴飨食举之乐,同时既包括前世振旅凯乐,又包括后世骑吹。因此,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说的‘汉《朱鹭》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谓之铙歌’,原本就并非仅指军乐而言。”“由鼓吹乐在汉代的上述诸端应用可见,今存《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之所以内容复杂,既不是因庄述祖所说的声辞相分,也不是因为它如陈本礼所说的汉杂曲,更不是如王先谦所说的是后人依其篇名另加新曲,而是因为汉代鼓吹乐的应用场合本身就是如此复杂的缘故。”“《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原不过是西汉创作的一组统一于鼓吹乐之下的普通诗歌而已。”<sup>⑦</sup>户仓英美认为,汉鼓吹铙歌是为了团结笼络一般民众而创制,这导致了十八曲歌辞内容的驳杂:“汉铙歌里意思明晓的几首歌,乍看吟咏世俗之情,和魏代以后各王朝的鼓吹曲相比,汉铙歌似乎更多民众性。我以为其原因不是在于汉代庶民用鼓吹曲制作世俗之歌,而是因为通过铙歌对帝国产生归属感的对象,首先是普通的民众百姓。《战城南》所要超度的就是无名兵士的魂魄,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汉铙歌编制的目的是在

① 《宋书·乐志》,第643页。

② 《太平御览》卷567:“魏武帝令曰: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敌众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63页。)

③ 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4页,第65页。

④ 参见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第81—83页。

⑤ 《文献通考》卷142,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47页。

⑥ 《乐府诗述论》,第309页。

⑦ 赵敏俐:《〈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研究》,《周汉诗歌综论》,第368、370、373页。



国家举行大规模活动中使用,使广大百姓万众一心归属于汉帝国。秦朝仅仅十五年的短命而终,因而西汉几乎是中国最初出现的大帝国,国家形态根本改变了,将从前属于诸国的人民都变为汉臣民就是国家当务之急。我们认为汉铙歌是为完成这个任务而编制。其中可能包括以鼓舞士气的军歌为其前身的几首歌。但铙歌之所以称为军歌的理由,是否因为所有的歌曲都用雄壮的军乐曲调来演奏?当时国家为了团结民众为国战斗,向人民夸示巨大财富的同时,炫耀武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形象的这方面是否主要由曲调来塑造?汉铙歌是为了掌握百姓而编制,后来开始运用于宫中的仪式。如这样考虑的话,其用途和歌辞之间的乖离现象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sup>①</sup>

以上所引王、赵二家见解部分地认识到了“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音乐文化背景,户仓英美的见解虽联系社会政治文化心理来分析,说法甚新,但可信性略显薄弱。比如,若“汉铙歌”为团结民众而编制,则歌颂汉政权的内容理应占大多数,但“其中有5首诗为颂美帝王之作,其余或写饮酒赋诗,或写男女恋情,或叹家庭之不幸,或伤世风而寄慨,或伤朋友之中道弃捐,或怀念家乡,或哀悼战死者,颇为杂乱”,<sup>②</sup>显然这样一组内容“颇为杂乱”的作品很难起到让一般民众“对帝国产生归属感”的作用。

上引诸家或以“铙歌”称汉鼓吹铙歌,或以“鼓吹”称之,称名不一。考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最早完整见录于沈约《宋书·乐志》,题名“汉鼓吹铙歌”;其后陈释智匠《古今乐录》亦收录,题名同;<sup>③</sup>《晋书·乐志》则说:“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sup>④</sup>《文心雕龙·乐府》亦将“轩岐鼓吹”和“汉世铙挽”分列。综合这些文献记载以及上文所论可知,汉鼓吹铙歌是综合鼓吹和铙歌两种音乐而出现的名称,它既包括四品乐第三品“黄门鼓吹乐”所用乐曲,又包括第四品“短箫铙歌乐”所用乐曲。因此,历来据歌辞内容探讨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性质而出现的种种分歧,以汉代鼓吹和横吹音乐内容的历史流变的视角来审视,可以获得完善而合理的解释。换言之,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之所以内容驳杂,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原本曾分别隶属黄门鼓吹乐和短箫铙歌乐。

结合上文关于明帝四品乐流变的讨论可知,汉鼓吹铙歌十八曲集结的年代应该在东汉章帝建初(76—84)以后。《太平御览》卷五八四:“《说文》曰:钲,铙也,钲柄中上下通钲也。铙,小铙也。军法:卒长执铙。汉有鼓吹曲,有铙歌。”<sup>⑤</sup>许慎将“鼓吹曲”与“铙歌”并论,说明《说文》编撰之时这两种鼓吹尚有明确的分别。案此记载不见于今本《说文》,

① 户仓英美:《汉铙歌〈战城南〉考一并论汉铙歌与后代鼓吹曲的关系》,《乐府学》第2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② 赵敏俐:《〈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研究》,《周汉诗歌综论》,第390页。

③ 《乐府诗集》卷16《汉铙歌》题解引,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587页。

④ 《晋书》,第701页。案韩宁认为,“可能在汉代短箫铙歌并没有专门的演奏机构和演奏人员,它的演奏是由黄门鼓吹乐人来承担的”,短箫铙歌之所以列于鼓吹,“最好的解释就是短箫铙歌和鼓吹的演奏都是一批人员,没必要给短箫铙歌单独设置一些乐人,就把短箫铙歌的曲辞列于黄门鼓吹乐之中,只是按不同场合演奏不同的乐曲罢了。”(韩宁:《〈乐府诗集〉“鼓吹”概念考论》,《文献》2005年第4期)若果如所论,短箫铙歌与黄门鼓吹为同一批乐人,则汉明帝将二者分别确定为四品乐不同品类的理由何在?一旦短箫铙歌用于战阵之中,黄门鼓吹乐人是否有随军出征的可能性呢?显然,韩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⑤ 《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33页。

若其可信,则鼓吹曲与铙歌之合并使用以及汉鼓吹铙歌十八曲集结的年代可以确定在许慎写成《说文》初稿到定稿成书的永初四年(110)至建光元年(121)前后。

## 七 结论

西汉有三种鼓吹乐:一为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最初主要用于君臣宴乐场合,亦辅助用于国家郊庙等各种重大的礼仪活动当中;二为新兴的短箫铙歌,是专门的军乐;三为横吹,是新兴的“乘舆以为武乐”的鼓吹新变曲,专用于歌颂皇帝的武功。东汉四品乐的第三品黄门鼓吹乐,专门用于宫廷宴乐及一些重大礼仪场合,其一部分为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一部分为继承西汉创制的横吹曲。

汉代新兴的鼓吹和横吹是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碰撞中产生的新的音乐品种,充分认识它们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有利于深入理解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动历程。汉代新兴的鼓吹乐与先秦类似音乐以及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乐之间最初存在本质不同。自西汉武帝至东汉明帝时期,主要来源于异域的横吹曲始终作为乘舆武乐来使用,直到东汉章帝建初年间以后,以之给赐边将军,横吹曲才获得了军乐的身份。正因为它从第三品“黄门鼓吹乐”中加入到第四品“短箫铙歌乐”当中,这才使得短箫铙歌也获得了鼓吹的名号。“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之所以内容驳杂,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原本曾分别隶属黄门鼓吹乐和短箫铙歌乐;这组作品的成立是以汉代鼓吹的上述流变为前提的。

就乐器组合来看,鼓吹最初指箫(长箫)与鼓合奏的乐奏形式。西汉武帝时,它兼指以胡角和横笛为主要乐器的横吹曲;东汉章帝时,它又兼指以箫(短箫)和铙为主要乐器的短箫铙歌。南朝宋齐时人刘勰撰《定军礼》,认为鼓吹的音乐特点是“鸣笛以和箫声”,但与西汉和东汉前期三种类型的鼓吹曲在乐器使用上都有所不同。林谦三:“胡笛是与胡人匈奴有关系的乐器如其名,汉人取为吹器之用,魏晋以来盛行并且中国化了。”林谦三考察引证了几乎汉魏时期所有关于笛的文献,并指出较早而可信的材料是张衡《西京赋》所云“校鸣葢”。<sup>①</sup>张衡写作《西京赋》的时间在东汉和帝永元十七年(105)前后。<sup>②</sup>因此可以确定,使用鼓、箫、笛三种乐器合奏的新的鼓吹曲,大约形成于和帝永元年间。这标志着汉代继承先秦传统的鼓吹与汉武帝时代新兴的短箫铙歌在东汉中期逐渐走向融合。其原因首先是短箫铙歌获得了鼓吹的名义,其次是长箫、短箫乐器的相通。这种融合中西音乐并以“鸣笛以和箫声”为特征的鼓吹曲,广泛运用于军中、朝会、道路和给赐等多种场合,并成为此后一直到隋初鼓吹曲的最主要形态。

(作者通讯地址:孙尚勇 西安 西北大学文学院 710127)

(责任编辑 晓文)

<sup>①</sup>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第365页。

<sup>②</sup> 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第456页。